

中外交通史籍叢刊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校注

〔唐〕義淨原著

王邦維校注

2

中華書局

中外交通史籍叢刊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校注

〔唐〕義淨原著

王邦維校注

中華書局

責任編輯：謝 方

中外交通史籍叢刊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校注

〔唐〕義 淨 原著

王 邦 維 校注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柵欄）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懷柔縣東茶壩印刷廠印刷

787×1092 毫米 $1/32$ ·10 $1/4$ 印張·2插頁·160 千字

1988 年 9 月第 1 版 1988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0 001—33 000 册

統一書號：11018·1409 定價：2.85 元

ISBN 7—101—00420—2/K·183

義淨和《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

——代校注前言

(一)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釋義淨撰。義淨本姓張，字文明，唐代齊州（治所在歷城，今山東濟南市）山莊人。生于太宗貞觀九年（635），卒于玄宗先天二年（713）。張氏祖籍范陽（今河北涿縣），義淨的高祖曾做過東齊郡守，大概因此後代遂居齊州。義淨自幼出家。高宗咸亨二年（671），他三十七歲時，從廣州取海路赴印度求法。咸亨四年（673）二月到達東印度耽摩立底國。其後在印度周遊佛教聖迹，在那爛陀學習十年。武后垂拱元年（685）離開那爛陀，仍取海路東歸，又在南海一帶滯留將近十年，於證聖元年（695）五月抵達洛陽。從此在洛陽與長安兩地翻譯佛經，直到去世。

唐代是我國封建社會的極盛時期。義淨活動的時期，正當初唐。唐王朝這時在政治和經濟上都極為強大，文化事業極一代之盛。由於統治階級的支持和提倡，佛教也得到很大的發展。有唐一代，到印度求法的中國僧徒不絕于路，形成一個高潮。人數之多，周遊地區之廣，歷史上空前絕後。造成這

種現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與中國佛教發展的狀況有關，另一方面又是由于新的大一統王朝建立，封建社會經濟繁榮，貿易發展，唐王朝政治勢力及影響遠布，中外通使頻繁，因此為這種大規模的求法運動提供了物質的基礎和交通上前所未有的便利，促成了它的實現。而這個時候在印度，佛教也正好達到了它發展的頂峯，後來就漸趨衰微。法顯、玄奘、義淨，是中國歷史上西行求法的佛教徒中三位最杰出者，前一位出現在東晉，後兩位却都出現在唐初，赴印的時間前後相距不過四十餘年，差不多算是同時代人，看來並非偶然。而且，玄奘、義淨從印度回來以後，都是蜚聲朝野，備受最高統治者的優渥，這與法顯也有所不同。義淨這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記述的唐初到印度求法的五六十位中國僧人的事跡，就是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發生的。

從義淨個人方面來看，他赴印求法的動機，應該說也和當時中國佛教的發展狀況有關。佛教在西漢末、東漢初時傳入中國，歷經魏晉南北朝，到了隋唐，不僅站住了腳跟，成為一大宗教，與儒、道鼎足而立，而且在中國的社會條件下，形成了具有中國特點的中國佛教，出現了真正的中國式的宗派。這是佛教的勝利。但是，佛教在唐初雖稱極盛，它作為一種被統治階級所利用的宗教，除了自身的局限性、弱點以外，教義混亂，戒律弛壞，又常常受到來自正統儒家和道教的攻擊，這些問題同樣還是沒有得到解決。玄奘西行，是因為佛教東漸以來，中國佛教徒對教義理解不明，歧異紛紜，發生混亂，所以決定到印度求取“真經”，以求解決中國佛教存在的問題。^①義淨西

行，也有些相似。義淨是虔誠的佛教徒，他年滿進具時，他的軌範師慧智禪師告訴他：“大聖久已涅槃，法教訛替，人多樂受，少有持者。”^②他西行求法，在思想動機上似乎很受此影響。當時佛教中藏垢納污，穢聞層出，不僅一般世俗羣衆不滿，佛教徒中有識之士也深有所感。比如幫助玄奘撰寫《大唐西域記》，又參加玄奘譯經，頗有點名氣的僧人辯機，與唐太宗的女兒高陽公主私通，被唐太宗殺掉，就是一時的丑聞。稍晚一點的武則天，表面上極端佞佛，實際上是想借佛教的影響來實現她做女皇帝的願望。於是僧懷義等就進上所謂《大雲經》，抬出釋迦牟尼來幫這位女皇進行“則天革命”，懷義等人又仗勢橫行，無惡不作。各地也多有欺凌百姓，爲所欲爲的惡僧。佛教中有的人，也就想通過整飭戒律，來矯治時弊，力挽頹風。玄奘到印度求法，特別重視佛教的宗教哲學理論，回國後通過翻譯和教授弟子，把印度佛教的瑜伽宗移植到中國來，創立了中國佛教的法相宗。而義淨在印度和南海等地，則特別注意觀察和記錄佛教的僧團制度、戒律規定。他從印度攜回和他一生翻譯的佛經，律最多，以卷數論，占總數的四分之三，“遍翻三藏，而偏功律部”，其意似乎即在於此。這與玄奘有所不同，却和法顯一樣。^③但是，佛教教門的腐朽敗壞，並未因此而止，因爲這不單祇是一個守持戒律的問題。“病根”不在此，義淨從印度借回的“藥”，當然無能爲力。所以他自己臨終前還是念念不忘教誨弟子們持律守戒，言語之間，對那些不遵佛家戒律的僧徒，仍然是痛心疾首。

(二)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一書，是義淨的主要著作之一。書成於武后天授二年(691)。當時義淨從印度東歸，尚停留在南海室利佛逝國，它以僧傳的形式，記述了唐初從太宗貞觀十五年(641)以後到武后天授二年共四十餘年間五十七位僧人(包括義淨本人，也包括今屬朝鮮的新羅、高麗，今屬越南的交州、愛州，今屬阿富汗的覩貨羅，今屬蘇聯的康國等地的僧人)到南海和印度遊歷、求法的事迹。後附《重歸南海傳》，又記載武后永昌元年(689)隨義淨重往室利佛逝的四位中國僧人的事迹。書成以後，從室利佛逝寄歸長安。一起寄歸的還有他同時寫成的《南海寄歸內法傳》及翻譯的其它一些經論。

在現存的宋以前記述海外交通與印度及東南亞情況的著作中，義淨的著作是值得重視的。由於文化傳統不同的關係，古代印度沒有這方面的專門著作，南海方面除了近代發現的一些碑銘可供間接參考外，幾乎沒有留下什麼成文的歷史資料。這種情形，在阿拉伯人來到印度和南海一帶以後才有所改變。但阿拉伯人大量地出現在印度和南海一帶，時間已是在公元八、九世紀以後。阿拉伯人的歷史地理著作則出現得更晚一些。在此以前，要了解當時中印之間以及南海一帶的交通，還有歷史、文化、宗教、地理方面的情況，主要仍得依靠中國方面的資料。在中國方面，除了正史中的《外國傳》與《地理志》一類的著作，及一些大多已經散佚了的筆記性質的專著外，更應該引起重視的就是佛教徒的著作。當時的佛教徒們出於宗教

的熱忱，舍生忘死，投身絕域，到印度求法，攜回了大量的佛教經典。這對豐富中國的文化，對各國人民之間的友好往來，都作出了有益的貢獻。尤為可貴的是有的佛教徒留下了記述求法時所見所聞的著作。這些著作，比起正史或筆記一類的著作，敘述往往更詳細，材料一般更可靠。因為前者是史官或文人學士所作，或錄自官方檔案，或綜括所見各書，或得於他人傳聞，精粗雜揉，常有想像之辭，而後者則是求法僧們身所經歷，親聞目見後所寫成。雖然由於宗教迷信的原因，其中常常也記載了一些神異傳說，但倘若剔除掉這些內容，其餘部分的可信程度仍是相當高的。這已經被事實所證明。義淨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就是現存的這些著作中的一種。而且，這部書裏幾乎沒有什麼有關神異的東西。

在義淨之前，到印度求法的中國僧人，最著名的是東晉時的法顯和唐初的玄奘，他們分別留下了兩部重要著作：《法顯傳》和《大唐西域記》。義淨赴印在唐咸亨二年，比玄奘祇晚四十多年。他在印度十餘年，來去俱遵海路，又在南海一帶先後停留十餘年。實際上，義淨在國外停留的時間是相當長的。唐代在他以後到印度去的中國僧人，比較著名的有悟空。他在天寶十載(751)出發，貞元六年(790)返國，來去俱遵陸路。至今在圓照撰《十力經序》裏還保留着他的行記。另外還有新羅僧慧超，去時時間無考，回到中國時間是開元十五年(727)，去時遵海路，回來循陸路。清末在敦煌發現了他寫的《往五天竺國傳》的殘卷。其後有宋一代，赴印求法的運動已成強弩之末，近于尾聲，留下的著作極少。保存在范成大《吳船錄》中的

《繼業行程》和敦煌文書中的《西天路竟》，^④ 相對來說都寫得非常簡略。因此，義淨的著作承上接下，就成為研究初唐時期中印關係，包括印度及南海地區歷史、文化、宗教的重要資料之一。法顯、玄奘、義淨是中國歷史上到印度求法最著名的三位僧人，他們成就最大，留下的著作價值最高，保存得也最好。近代西方以及日本研究東方學的學者們很重視他們的著作。他們以《大唐西域記》、《法顯傳》等為研究課題，翻譯、註釋，結合進行考古發掘，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他們也注意到了義淨的著作。這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先後被翻成法文、英文、日文，並且被作為重要史料在各種著作中不斷地引用。可以說，在當今所有研究七世紀後半期印度佛教、東南亞歷史的著作中，幾乎沒有一本不提到義淨和他的著作。

(三)

和玄奘的《大唐西域記》比較起來，《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有自己的特點。《大唐西域記》記載的是當時稱為“西域”（印度、中亞及今我國新疆）的一百二十多個國家的情況，是一部地理志類型的著作，範圍廣，內容細，確實是一部杰作。後者因人立傳，祇是一部傳記著作，而且所記人物較多，有的就記述得比較簡略，後者的價值似乎比不上前者。但是仔細比較，義淨赴印和著作的時間既略晚於玄奘，所聞所記，好多地方正可與《大唐西域記》相補充。比如一些晚於玄奘時期的人名，一些《大唐西域記》未記的地名，在義淨的書中間有出現。對著名的那爛陀寺的建築情況、寺院管理制度，玄奘所記比較空

泛，義淨則所記甚詳。而且，篇題《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本身就是研究中印關係史、交通史、宗教人物傳記史的重要資料。義淨大概見過玄奘。因為玄奘在世時，他正是一位青年僧人，遊學兩京，那時玄奘的聲譽正隆。正是玄奘的榜樣，激勵他把赴印求法的願望付諸實現。他也讀過《大唐西域記》，這從他寫的《南海寄歸內法傳》和本書中隱約可以看得出來。這大概是他沒寫下和《大唐西域記》相似的著作，而把重點放在其它的方面的原因之一。

僅僅祇從中印交通歷史的發展情況來看，《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就有好多值得注意的地方。比如從唐代的長安，經過今甘肅、新疆、中亞等地前往印度的道路，是自漢以來中印之間陸上最主要的交通路線，《大唐西域記》和以記述玄奘個人經歷為內容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有關的記載是比較詳細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於此所記極少，但却記載了唐初新開通的經過今西藏、尼泊爾到印度的道路，又比較詳細地記載了從南海往印度的交通情況，由此反映出唐初以及以後中印交通發展的新趨勢和新情況。

照義淨自己的說法，《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所記求法的僧人，“其中次第多以去時年代近遠存亡而比先後”。上卷起自玄照，時間是貞觀年中（確切地說是貞觀十五年以後）。第一至第七人俱從陸路往返（其中第四、第五兩人語焉不詳，但揣其文意，仍是取陸路）。從第八、第九兩人開始，有從海路赴印的記載。但在第二十一人以前，也僅有第十三、第十四兩人是從海路赴印的。從第二十一人開始，就方向大變，幾乎全是取海

路的記載了。僅有第三十人、第三十三人、第三十八人、第三十九人、第四十人共五人是從陸路往印度，而且後三人也祇是得之傳說。第四十一人慧輪雖是從陸路往印度，但他在麟德二年奉勅隨玄照西行，時間甚早。上卷共記四十一人。至於下卷所記十六人以及《重歸南海傳》所記四人，則都是取海路往返的了，時間迄至義淨返國的長壽三年或證聖元年。（其中祇有道琳、智弘、無行擬取北道返國，但道琳、智弘“聞爲途賊斯擁，還乃復向北天。”無行卒於路途。）祇要按時間順序排列一個表，這種交通路線轉變的趨勢便很容易看出來。從義淨文中對年代時間的記載推斷，這種轉變大致發生在高宗麟德年以後。再有，即使是從陸路西行的僧人（包括國家使節），取傳統的新疆、中亞道往印度的也不多，而多取新開闢的更爲便捷的西藏、尼泊爾道。這是值得注意的新情況。祇是因爲政治上的原因，這一條道路並未能長期維持暢通。這與海路又有所不同。

（四）

義淨以前，南海海路已通。《漢書》卷二八下《地理志》最早記載了中國到印度的航程：

“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國。又船行可四月，有邑盧沒國。又船行可二十餘日，有諶離國。步行可十餘日，有夫甘都盧國。自夫甘都盧國船行可二月餘，有黃支國，其俗略與珠厓相類。其州廣大，戶口多，多異物，自武帝以來皆獻見。……自黃支船行可八

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黃之之南，有己程不國，漢之譯使自此還矣。”

日南地在今越南中部，徐聞、合浦在今廣東、廣西，其餘地名近代各家的考證衆說紛紜，但說黃支一名指的是今印度的某一個地方，則基本上沒有什麼分歧。^⑤《漢書》所記，是公元前及公元初的情況。在兩漢以後，中國出使南海的使人、泛海貿易的中外商人、傳教與求法的僧人，頻繁往來，史不絕書。法顯從陸路去，海路還。玄奘從陸路去，印度鳩摩羅王一度也建議他從海路返國，說：“師取南海去者，當發使相送。”^⑥可見中印之間海路的交通從來沒有中斷。而到了唐代，顯然更有了新的發展。杜佑在《通典》卷一八八中對此有一段很好的總結：

“日南郡其徼外諸國，自武帝以來皆獻見。後漢桓帝時大秦天竺皆由此道遣使貢獻。及吳孫權遣宣化從事朱應、中郎康泰使諸國，其所經及傳聞，則有百數十國，因立記傳。晉代通中國者蓋尠。及宋齊，至者有十餘國。自梁武隋煬，諸國使至，踰於前代。大唐貞觀以後，聲教遠被，自古未通者，重譯而至，又多於梁隋焉。”

杜佑所言，本來是講中外之間的通使，其實古代外國來“貢獻”的使節，多半帶有到中國來貿易的目的，或有商人隨行，或者自己本身就是商人。

從義淨的記載看，南海交通的路綫並非一道。或從廣州登船，或從交陞，或從占波登船，或經佛逝，或經訶陵，或經郎迦，或經裸人國而抵東印度耽摩立底，或從羯荼西南行到南印度那伽鉢夏那，再轉赴師子國，或復從師子國泛舶北上到東

印度諸國，或轉赴西印度。道途衆多，不一定限定爲某一條固定的路線。《新唐書》卷四三下《地理志》中賈耽所記的路線，不過祇是其中一條比較主要的路線而已。^⑦足見當時海上交通的頻繁與範圍的廣大。

義淨所記載的到印度求法的中國僧人。取海路的人數最多，這並非偶然。在義淨以前，中印之間海上的聯繫固然存在，但通過今新疆、中亞而來往的陸路是主要的通道，這就是著名的陸上“絲綢之路”。而從義淨這個時期開始，海路就逐漸成爲主要的通道。陸路雖然仍然存在，但是時通時阻，重要性顯然就不如以前，漸漸讓位於海路了。不僅中國僧人多取海路往返，印度僧人，比如永徽六年(655)到長安的那提，開元七年(719)到廣州的金剛智、不空，也都經海路來到中國。那提後又返回南海。不空在開元二十九年(741)從海路返回印度，復從海路再來中國。海路在這一時期成爲重要通道，有兩個原因，一方面是由於政治形勢的變化，一方面還是社會經濟發展的結果。唐初平定西突厥後，西域的通道曾一度極爲暢通，從太宗後期到高宗前期，唐王朝在西域設州置府，統治穩定，聲威極盛。這時吐蕃興起，開始時與唐王朝關係很好，但後來關係又惡化。咸亨元年(670)吐蕃陷安西四鎮，其後長壽元年(692)雖然重新奪回，安史亂後却又沒於吐蕃。也是在這個時候，阿拉伯人的軍事勢力也到達了中亞地區，開始與唐王朝發生直接的衝突。天寶十載(751)，唐將高仙芝在怛邏斯城下與大食兵遭遇，唐軍大敗，被俘者甚衆。這些都使西域的道路不再如以前一樣通行無阻。義淨在這部書裏就記載了一位

中國僧人玄照因此而未能歸國的事，從側面反映了這一形勢的變化。在另一方面，中國的經濟重心自東晉開始大規模南移以後，南方的經濟發展逐漸超過北方，經南北朝、隋朝，到了唐代，更是如此。唐代社會經濟繁榮，生產發展，隨之而來的是商業貿易的發達，南方的都市不僅成爲國內貿易的中心，有的還成爲國際貿易的商港。廣州就是當時最大的對外貿易的城市，商舶雲集，蕃胡衆多。北方進行的陸路對外貿易的規模顯然再也比不上南方海路對外貿易的規模。這種對比，在唐及宋代非常明顯。當然，與海路交通直接有關的造船技術和航海技術在這時有了新的提高和發展，也是促使這種形勢出現的一個重要因素。船舶載物既多，獲利亦大。南海交通暢達，成了聯繫中外各國、中印兩國之間的“新幹綫”，求法與布教的僧人所以多取海路往返了。

西藏尼泊爾道的開通，與當時吐蕃的興起和吐蕃政權與唐王朝的友好關係有關。這當然大大地促進了中國內地與西藏地區，中國與尼泊爾、印度之間經濟文化的交流，其意義和影響在這裏就不多談了。義淨所記中國僧人經過這條道路赴印求法的情況，也反映了這一歷史事實。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裏還提到一條從今雲南到印度的道路。這條通道因爲路途艱難，經行不易，往來的人不多，有關的記載也很少。但在西漢武帝以前，它就已經存在，而且實際上一直沒有中斷過。中印文化在這一個方向所進行的接觸和相互的影響，過去研究得比較少，現在還值得進一步深入地研究。

僧人們求法和布教的路綫，其實就是商業貿易的路綫。佛教從一開始似乎就和商業與商人結下了不解之緣。從義淨的記載中也可以看到，僧人們泛海，多是附商舶，與商人結伴而行。陸行也同樣如此。當然，在交通極不便利的古代，除了奉命銜節的使人，也祇有商人和僧人肯背井離鄉，忍受辛苦，冒着生命危險，往來跋涉於中外之間。

(五)

義淨一生，著譯甚多。過去一般都根據《宋高僧傳》卷一的說法，說他譯經五十六部，共二百三十卷，又撰《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等五部九卷。《宋高僧傳》的說法來自《開元錄》卷九。《開元錄》並且把這一共六十一部二百三十九卷翻譯的經名和撰述的著作名都一一載入經錄。但是倘若根據現存的資料仔細地進行校核，則不止此數。《開元錄》所錄五十六部經和五部撰著，除《法華論》、《集量論》兩部九卷外，現在全部存在。但現存義淨所譯的佛經，還有根本說一切有部律七部五十卷，是《開元錄》沒有收錄的，智昇似乎當時就沒有見到。這七部經是：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藥事》二十卷（今《大正藏》本作十八卷）；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二十卷（《貞元錄》注：“內欠二卷”。但今《大正藏》本實作二十卷）；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出家事》五卷（《貞元錄》注：“內欠一卷。”今《大正藏》本作四卷）；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安居事》一卷；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隨意事》一卷；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皮革事》二卷；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羯恥那事》一卷（《大正藏》

本題作《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羯恥那衣事》）。

它們中有的梵文原本已在近代被發現，因此譯本和原本都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另外，在現存的各種《大藏經》中，還有一些零散的題為義淨譯著的作品（其中有些可能是重出）。先天二年義淨去世時，盧瓌為他撰寫《塔銘》，稱他“前後所翻經一百七部，都四百二十八卷，並勅編入一切經目。”^⑧《開元錄》所記及現存所能見到的總數，都和這個數目相差甚遠。大概義淨在世時，一部分作品翻譯以後沒有完全整理定稿，死後很快就散佚了。《開元錄》說他“又出說一切有部跋率堵約七八十卷，但出其本，未遑刪綴，遽入泥洹，其文遂寢。”^⑨前面說的那七部律，可能就是這其中的一部分。有的作品，比如《集量論》，是陳那很有名很重要的講因明的著作，開元十八年智昇編定經錄時，時距義淨去世不過十多年，就已經“失本”，看不到了，而且以後就再也沒有出現過（梵本亦不存，現尚存藏譯本，有現代新漢譯本^⑩）。有的後來却又重新出現，比如那七部“有部律”，六七十年後，圓照却看到了，在貞元十六年（800）把它們補充進了經錄。在早期經錄未載的義淨著譯的作品中，有《梵語千字文》。它是否真是義淨所著，曾有爭論，但却是一部有用而又顯得有點特別的書。國外進行研究的人不少。印度學者師覺月有專門的著作。^⑪此外，在《全唐文》卷九一四中，

尚收有義淨《少林寺戒壇銘并序》一文（亦收入《金石萃編》卷七十）。《貞元錄》卷十三中錄有義淨臨終時所寫的《遺書》。宋法雲編的《翻譯名義集》卷七有《題取經詩》一首。再有就是義淨自己提到的《南海錄》、《西方記》、《西方十德傳》、《中方錄》四部書，很像是義淨自己的著作，但除了義淨自己提到以外，不見於任何其它書中，看來也是很早就佚失了。也許以後還能有發現的機會。從書名看，倒是研究古代印度和南海的好材料。

這裏順便還應該提一下義淨的另一部重要著作《南海寄歸內法傳》。這部著作與《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同時寫成。它記述了當時印度和南海方面許多情況，雖然是以佛教為主要內容，但除了為研究古代這些地區的宗教歷史提供材料外，我們也可以從中發現好些有關社會經濟生活、文化發展狀況、甚至醫藥衛生方面的資料。因此很早就引起了西方及日本學者們的注意。

（六）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一書，過去在國內還沒有人作過全面的整理工作，但西文的譯本很早就出現了。一八九四年，法國人沙畹 (Ed. Chavannes) 曾把它譯為法文，在巴黎出版，題為：

Mémoire composé à l'époque de la grande dynastie T'ang sur les religieux éminents qui allèrent chercher la loi dans les pays d'Occident